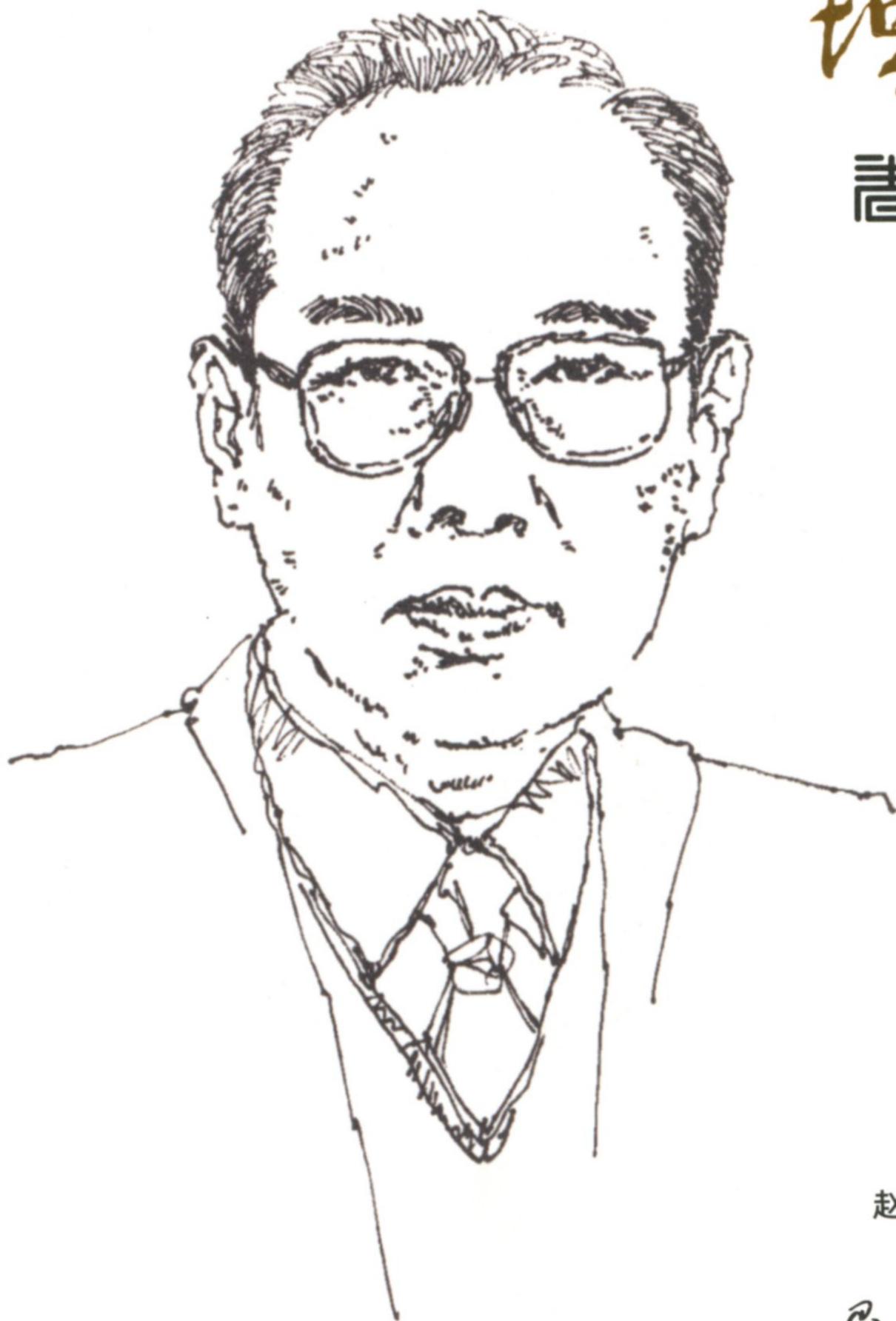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家学术文集

# 赵殿增

著



纪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成立七十周年

赵殿增 著

巴蜀书社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家学术文集

赵殿增  
著

赵殿增 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家学术文集. 赵殿增卷 /  
赵殿增著. -- 成都 : 巴蜀书社, 2023.11

ISBN 978-7-5531-1957-1

I. ①四… II. ①赵… III. ①文物—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K870.4-53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60480号

SICHUANSHENG WENWU KAOGU YANJIUYUAN MINGJIA XUESHU WENJI·ZHAO DIAN ZENG JUAN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家学术文集·赵殿增卷

赵殿增 著

策 划	周 颖 吴焕姣
责任编辑	周昱岐
封面设计	冀帅吉
内文设计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出 版	巴蜀书社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38号新华之星A座36楼 邮编：610023 总编室电话：（028）86361843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36185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23年1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插 页	16页
印 张	32.25
字 数	4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1957-1
定 价	128.00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 总序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为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成立于1953年5月1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我院从不足30人的团队起步，逐渐成长为一个拥有185人编制，兼具考古、文物修复、文化遗产保护、《四川文物》编辑出版四大职能的综合性考古机构。

七十年来，全院职工戮力同心，探索历史未知、揭示历史本源，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共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1项、中国考古新发现4项、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项、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5项、田野考古奖3项，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了四川力量。

饮水思源，回顾我院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无一不浸透着我院一代代文物考古工作者拼搏奋斗的艰辛。在我省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他们始终恪守初心，身体力行地积极投身于四川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缔造，甘之如饴地用心守护着巴蜀大地的文化遗产。在他们的努力下，四川先秦考古学的文化序列日渐完整，巴蜀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逐渐明朗，西南地区的历史轴线不断延伸，古代四川的文化面貌愈发清晰。他们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四川考古争得了荣誉，更为我院今天的厚积薄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家学术文集》是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七十周年华诞而发起的一套纪念性文集，共九卷，分别收录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名家秦学圣先生、沈仲常先生、李复华先生、王家祐先生、曾中懋先生、赵殿增先生、黄剑华先生、张肖马先生、陈显丹先生的代表性学术论文。

这些老前辈中，有的是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初创成员，有的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文物考古工作者，有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文物考古事业从蹒跚起步到步入“黄金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从旧石器时代考古到明清时期考古，从青藏高原的遗址发掘到长江三峡的文物抢救，前辈们筚路蓝缕，风餐露宿，心怀使命与赤诚，在巴蜀大地上写就了锦绣文章。他们将四川考古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考古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在本职工作之外，前辈们对待后学更是关怀备至，倾囊相授，无私扶掖，令我们感念不已。

本套文集所收均为前辈们的心血之作，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材料运用充分详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视野开阔，旁征博引，富于创新精神；论述严密，分析鞭辟入里，给人以深刻启发；多学科手段交叉运用，研究路径多元。这些文字饱含着前辈们的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充分展现了他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嘉惠学林、泽被后学，本套文集既是我院七十年学术发展历程的缩影，也是我院后学接续前辈们的学术脉络，踔厉奋发、继往开来的新起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衷心期望我院全体干部职工以前辈们为榜样，传承前辈们的优良学统，勇于担当，努力成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在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面开展文物考古研究和探索实践，笃行不怠，奉献出更多、更新、更好的学术成果，进一步积淀我院的学术底蕴，为我院创建世界一流考古机构注入崭新力量。

唐飞

2023年10月

## 作者简介

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男，回族，1943年12月生于河北省大厂县，1962~1967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65年到安阳考古实习，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商代墓葬。

1968年7月分配到四川，先在7848部队劳动锻炼，1970~1972年在会东县委宣传部任干事。1973年2月调到四川省博物馆，归队从事考古，1982年调整到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后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历任四川省博物馆古代史部副主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长、副所长，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汉画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2004年初退休。

在四川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和业务组织工作四十多年，主持了安宁河调查及西昌礼州遗址、茂汶石棺葬、严道古城发掘等二十多个项目课题，重点参加了1980年以来三星堆的调查发掘研究，特别是八九十年



代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城址的发掘研究组织工作。

主攻方向为四川考古学文化序列与专题研究，特别是以三星堆文化为中心的古蜀文化研究，撰写发表了《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巴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的新进展》《四川世纪考古的回顾与展望》《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茂汶石棺葬发掘报告》《“天门”考——兼论四川汉画像砖（石）的组合与主题》等百余篇考古报告和论文，在三星堆文化的性质与内涵、巴蜀文化的分期与序列、古蜀文明的进程与特征等问题上有所创见。

近年根据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又将原来的观点进行了归纳和提炼，发表了《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从古城址特征谈宝墩文化的来源》《我对三星堆文化特征成因的认识》《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神坛、神庙、祭祀坑》等一组文章，提出了一组比较系统的新观点，可供研究参考。

先后参与编辑了《中国青铜器全集》（任编委和巴蜀卷主编）、《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任编委和分卷主编）等书。其中《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等论著两次获省政府奖，《中国青铜器全集》获国家图书奖。个人主要著作有《三星堆考古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长江文化文库——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合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专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等书。

先后赴塞尔维亚、北马其顿、瑞士、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及中国台湾等地区进行过学术文化交流活动。



图版一 2016年作者在三星堆前留影



图版二 作者所著有关三星堆的专著、合著、论文集



图版三 作者在三星堆一号  
青铜大神树前留影



图版四 作者在三星堆博物馆  
青铜馆前留影



图版五 1986年夏，作者与省考古队员、川大林向教授等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工棚前合影



图版六 2006年三星堆发掘二十年纪念会期间，与参加1986年三星堆考古发掘的主要人员合影



图版七 1998年作者与省考古所同事在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



图版八 2000年作者在月亮湾考古现场向记者等介绍情况



图版九 2000年作者在月亮湾城墙遗址接受电视采访



图版十 1994年《中国美术全集 中国青铜器全集》出版后，编委会全体人员在北北京聚会



图版十一 1998年作者在三星堆博物馆接受电视采访



图版十二 2017年在什邡桂圆桥遗址研讨会上发言



图版十三 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座



图版十四 2002年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开播活动留影



图版十五 2002年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开播与西部学者、画家合影



图版十六 2013年与李伯谦先生在三星堆青关山遗址合影



图版十七 1996年与俞伟超、敖天照先生合影



图版十八 2012年，在“北大考古九十年”纪念展与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合影



图版十九 2022年，在三星堆考古大棚与北大赵昊博士、省考古院唐飞院长合影



图版二十 1998年在三星堆博物馆与敖天照先生共同研究



图版二十一 2016年三星堆祭祀坑发掘三十年纪念会，与旧金山博物馆馆长许杰及敖天照先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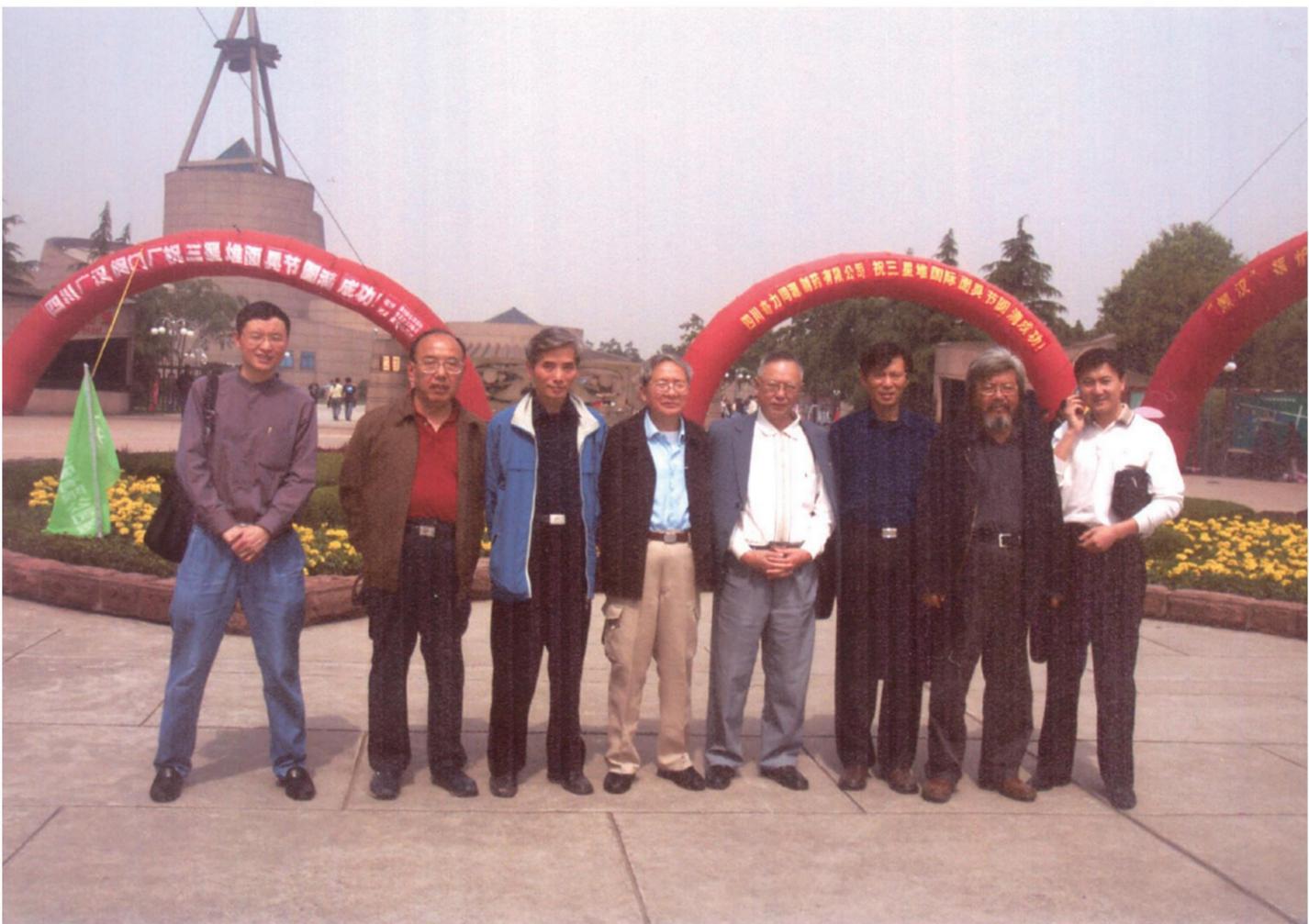
图版二十二 2012年与加州大学罗泰教授、伦敦大学罗森教授、牛津大学伦福儒教授在“北京大学考古90年展”合影



图版二十三 2017年与三星堆博物馆领导在成都世纪城展厅合影



图版二十四 三星堆博物馆考察团在西安碑林留影



图版二十五 四川史学团从三星堆博物馆出发赴西北考察



图版二十六 1993年，参加瑞士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暨申奥国文物展开幕式



图版二十七 1993年，在德国汉学家郭乐知教授家做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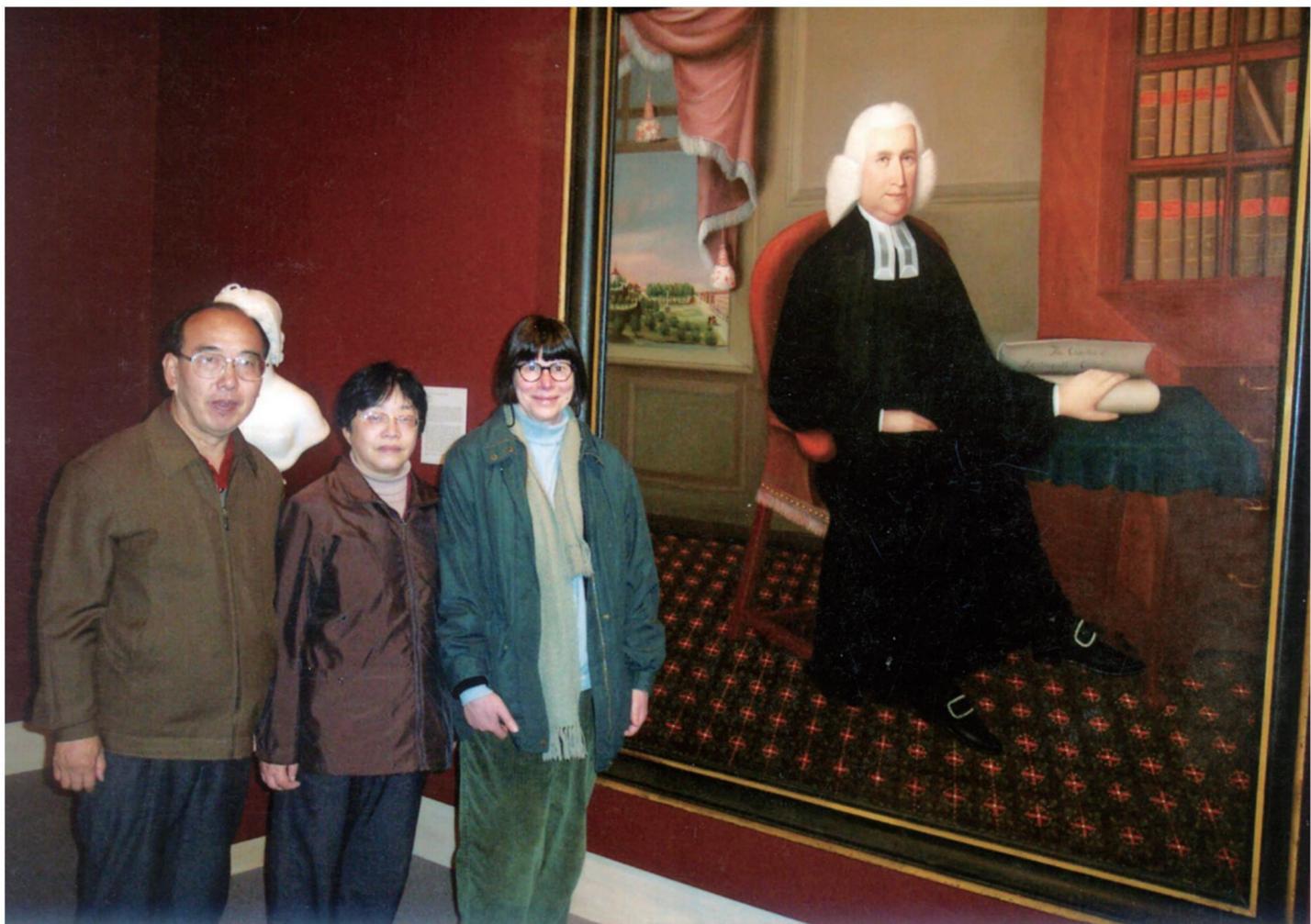
图版二十八 1999年在日本东京“三星堆”文物展与陈德安、世田谷美术馆馆长合影



图版二十九 2000年“三星堆传奇”文物展代表团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留影



图版三十 2000年“三星堆传奇”文物展学术团在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作报告



图版三十一 2003年与艾兰教授在美国达慕思大学博物馆合影



图版三十二 2003年在美国明德大学与同行座谈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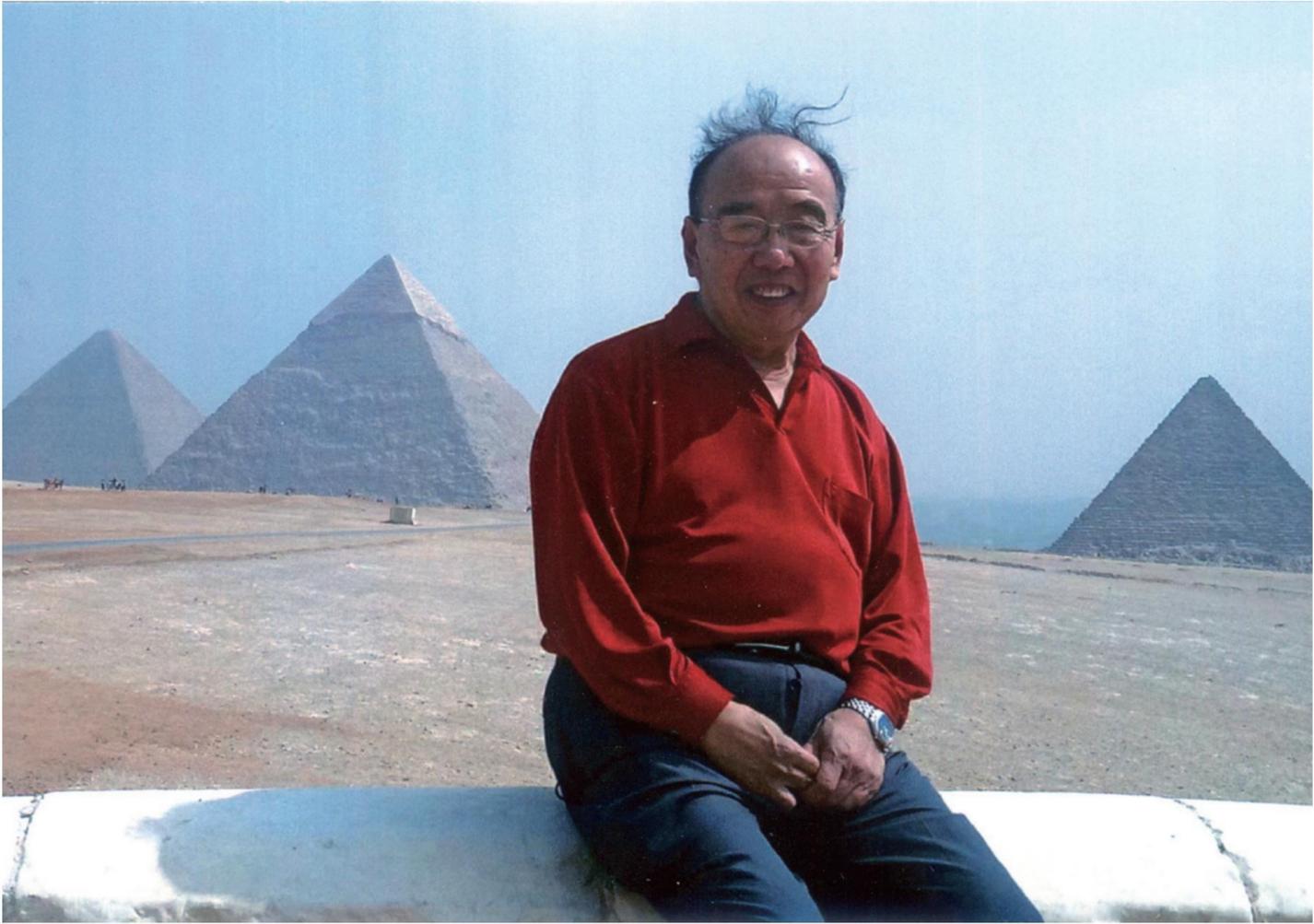
图版三十三 2003年与哈佛大学友人在哈佛先生铜像前合影



图版三十四 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与同行合影



图版三十五 2016年在印尼巴厘岛神庙留影



图版三十六 2017年在埃及金字塔留影



图版三十七 2017年在埃及阿布—辛拜勒神庙留影



图版三十八 2007年北大62级考古班首次同学会在雁栖湖合影



图版三十九 2012年北大62级考古班同学会在“北京大学考古90年展”上合影



图版四十 2018年北大62级同学会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前合影



图版四十一 2008年作者一家三代合影



图版四十二 1998年与爱人袁曙光在三星堆博物馆前合影

# 目 录

诗序 谭继和 / 001

自序 我的考古研究观点概说 / 003

## 导 论

20世纪80年代的四川考古 / 015

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1979～1989） / 027

## 文化序列研究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古蜀文明新认识 / 051

从古城址特征看宝墩文化来源

——兼谈“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 / 071

略谈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关系 / 093

## 文明形态研究

- 略论古蜀文明的形态特征 / 105
- 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 / 119
- 略谈巴蜀文化与巴蜀文明 / 149
- 我对三星堆文化特征成因的认识 / 157
- 浅谈三星堆遗址青关山F1的结构与功能  
——兼与杜金鹏先生商榷 / 169

## 祭祀文化研究

- 三星堆祭祀形态探讨 / 181
- 略论三星堆祭祀坑 / 207
- 三星堆祭祀文化研究 / 230
- 祭祀坑—神庙—神权国家  
——试析三星堆之谜 / 244
- 三星堆青铜神树  
——早期文明的“自然崇拜” / 256
- 骑虎铜人像与玉琮线刻人像  
——兼谈三星堆、金沙与良渚文化的关系 / 262
- 三星堆祭祀坑为“神庙失火说”的几点疑问 / 272
- 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神坛、神庙、祭祀坑 / 284

## 天门观念研究

三星堆“祭祀图”玉璋再研究

——兼谈古蜀人的“天门”观 / 311

略论三星堆文化与四川汉画的渊源 / 321

“天门”考

——兼论四川汉画像砖（石）的组合与主题 / 329

“天门”续考 / 348

四川三国时期的画像与佛像 / 356

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 / 367

## 区域文化研究

金沙江流域早期考古的几个问题 / 381

绵阳文物考古札记 / 396

严道古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403

东汉石刻李冰像在都江堰出土 / 416

## 附录

论著目录 / 423

《三星堆考古研究》目录 / 430

《三星堆考古研究》后记 /	434
《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内容提要 与后记 /	438
《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后记 /	442
一位37年三星堆文化“守护者”的自白 ——对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赵殿增 /	445
考古学家赵殿增：一生两大幸运 遇见三星堆和她 /	450
与考古一生相伴 /	455
后 记 /	507
编后记 /	511

## 自序

我的考古研究观点概说

本书是我个人第一个论文集《三星堆考古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的续集，主要是近二十年来我在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方面有关论文的汇集，也有几篇早期的文章，共计28篇，附录8个。这也是我对专著《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与合著《长江文化研究文库——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补充研究，上述三本书的文章目录和提要后记，以及我的全部论著目录，可参见本书的附录。

由于不是有计划撰写的系列文章，本书各篇文章的体例与文笔不太统一，内容也有重叠之处，在各篇文后，注明了原发表处的书刊期号，阅读时请注意文章发表时间。本书总的学术观点与上述三本书是一致的，同时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又有一些补充和修正。这里结合本文集中的主要文章和章节，做些简要说明。

三星堆遗址从1980年起连续进行了三十多次正式发掘，前后经历了两次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考古事业蓬勃开展，是“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开始阶段。四川初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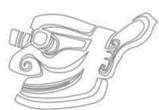
建立了三四千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命名了“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特别是1986年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另一次是2020年党中央提出要努力建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全国考古工作出现了新的高潮，“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真正到来。三星堆在中心祭祀区又发现发掘了六个大型祭祀坑，建起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考古工作大棚，发掘出上万件珍贵文物，通过三十几个单位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取得了一批重大科研成果，再次震惊世界。我有幸经历了这两个时代，在本文集的导论中，收录了两篇关于20世纪80年代四川考古工作和业务成果的回忆文章，供大家参考。

我对三星堆考古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可以概括为“文化序列”“神权国家”“天门信仰”三个方面，表述了我对四川考古学文化与蜀国历史、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特征、古代蜀人信仰观念等问题的基本认识。2004年退休后，我把研究重心转移到探索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成因与价值等方面，又有一些新的认识，这里概述如下。

“文化序列”是指从20世纪80年代初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进行分期研究开始，我逐步认识到四川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并探讨了它们与古蜀历史的相应关系。

众多学者综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巴蜀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古蜀文明进程做了长期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蜀文化最早从西北进入成都平原，相继建立了几个政权，可能是一种主流意见；而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明的最终形成，则是多元文化进行交流互鉴的结果。近年来我对从长江中游进入四川的古文化情况又做了些研究，认为这可能也是古蜀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目前我对四川考古学文化与古蜀文明发展进程的基本认识是：由于水患等原因，川西平原的古文化产生的时间比较晚，它们主要是由盆地周边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文化逐步汇合而成。在距今5000年左右，从西北山区率先进入成都平原的一支古文化，在什邡创立了“桂圆桥文化”。距今4800年左右又前进到三星堆遗址，

创造了“三星堆一期文化”，并在三星堆遗址连续发展了两千余年。距今4500年前后，有一支因尧舜“征三苗”而被迫西迁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人群，从长江中游来到成都平原西南部，使用与长江中游古城址群相同的两面堆土的特有方法，修筑起了八座“史前古城”，与本地原有文化结合，形成了“宝墩文化”。距今4000年以后，长江中游的又一批三苗人，可能是受到大禹第二次南征的驱使，经由长江三峡地区来到了三星堆遗址，结合多方文化，创立了“三星堆文化”。在距今3500～3000年前后，可能是最后的一批三苗人的后裔，携带着从盘龙城商城传入长江流域的中原地区先进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和器物造型，并带着三苗人比较成形的神权国家形态，再次来到三星堆古城，与本地居民原有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观念相结合，用新材料新技术制造出了大量感谢天地万物和祖先神灵的神像和祭器，创造出神奇灿烂的“三星堆文明”。距今3000年前后，在遇到严重瘟疫之类的特大灾难，造成人畜大量死亡时，人们认为这些神器可能已经彻底“失灵”了，于是通过多次隆重的“燎祭”仪式，虔诚有序地打碎焚烧掩埋了神像祭器，表示把它们送回到了天上神界。然后迁都到了金沙遗址，形成古蜀国新的政治中心和距今约3200～2600年的“十二桥文化”。金沙时期的经济能力和祭祀规模都有所减弱，但仍然保持了很多神权国家的传统，并进一步学习中原的青铜技术和礼制，创造了羊子山土台和彭州铜器群。“十二桥文化”最后可能是遭遇水患而逐渐衰亡，在距今2600年前后，由荆楚川东地区过来的另一群人，与当地原有文化再次结合，占据了蜀国的统治地位，形成了“晚期巴蜀文化”。当时大量“巴蜀图语”的出现，说明人们对神权的信仰仍然很严重，虽然经过开明九世（五世？）“始立宗庙”等礼制改革，出现了“新都蜀王大墓”中那种成套的大型青铜礼器群，但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时的蜀国可能仍然保持着“人自为战”的军事体制，在秦军的攻击下一战即亡。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之后，以此作为统一全国的前进基地，加强了蜀郡的政权管理，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修筑了都江堰和成都城，使蜀地很



快发展成为“天府之国”。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为加速中华文明的融合和统一，加快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

关于各阶段考古学文化与历代蜀王的关系，史籍传说蜀史中“五代蜀王”的后面三代，即鱼凫、杜宇、开明氏蜀国所属的考古学文化，近几十年已经基本得到了证实。最近我们又进一步提出“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可能分别为“蚕丛氏蜀国”与“柏灌氏蜀国”的看法，从而可以把四川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蜀历史的关系简要概括如下：

“桂圆桥文化”（约距今5000～48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初入平原；

“三星堆一期文化”（约距今4800～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蚕丛氏蜀国；

“宝墩文化”（约距今4500～37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柏灌氏蜀国；

“三星堆文化”（约距今4000～3000年，青铜时代早期—夏商）——鱼凫氏蜀国；

“十二桥文化”（约距今3200～2600年，青铜时代中期—商周）——杜宇氏蜀国；

“晚期巴蜀文化”（约距今2600年～公元前316年，青铜时代晚期—春秋战国）——开明氏蜀国；

“巴蜀文化余存”（约公元前316年～公元前100年，秦—西汉）——融入汉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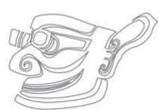
这是我在现有考古资料基础上进行探讨后形成的新认识，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具体的论述可以参见前三本书和本书“文化序列研究”一章中的几篇文章。

“神权国家”是指我对三星堆文化特征的基本认识。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三星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神”，21世纪初认识到

“神权国家可能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到纪念一、二号祭祀坑发掘三十年时认为“三星堆文化阶段可能仍然是个神权古国”这样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我认为“神圣的信仰”是它的精神主体、“神奇的艺术”是其表现的形式、“神秘的历史”是所产生的结果，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神权古国”这样一个文化定位。

三星堆文化可能是在良好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比较封闭的地理条件下，造成了一个特殊而滞后的社会形态，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和文化传统的“神权国家”，这是出现神奇的三星堆文化的内在原因；而“早期丝绸之路”初期所产生的多方面文化交流，则是三星堆文化面貌丰富多彩的外部原因；“过度消耗”是三星堆快速衰亡并形成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由；“多元一体”是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定位。

从祭祀坑中已发现的大量文物中可以看出，三星堆文化时期信仰的是以“万物有灵”观念为中心的“原始宗教”，包括以青铜神树、太阳形器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以鱼鸟龙蛇为代表的“图腾崇拜”，以纵目面具为代表的“祖先崇拜”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由代表群巫之长即国王的“青铜大立人像”、代表各级巫师首领的众多“青铜人头像”和各种从事祭祀活动的小型人像构成的“巫祭集团”，共同组成了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实际统治者。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多件“青铜神坛”和玉璋上的“祭祀图”线刻图像等，反映了三星堆天地人神相通的世界观和进行经常性宗教祭祀活动的具体场面。我们进一步研究认为：三星堆青关山遗址近年发现的“一号大房子”，有可能是一座位于高台之上的“神庙”，它既是可以安放保存大量神像祭器物进行重要祭拜活动的“庙宇”，又是举行重要集会议事决策以行使国家权力的“殿堂”，可能就是整个“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宗教和政治统治的中心，是反映三星堆繁荣时期祭祀形态的最重要的建筑物。祭祀区众多大型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神像和祭器，原来可能主要是放置在这些“神庙”之中的。各种形态的“神坛”，与众多青铜神像、人像、神兽、神器的大量出现，表现了三星堆古人进行大量祭祀仪式时的理想形式，反映出举行各种祭祀活



动已经是当时社会的常态，成为三星堆神权国家逐步走向成熟、兴旺发达起来的重要标志。而存放神像祭品并举行祭祀活动的“神庙”的逐步兴建和不断扩建，就成为三星堆神权国家举行经常性祭祀活动和履行管理职能的中心场所，形成了整个国家的宗教和政治统治中心。三星堆古人在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仪式之后，还形成了一种最后要将祭祀用品埋入土坑之中的特有习俗，用以表示将它们送往了天上和神界，表达出对天地万物祖先神灵的敬重与奉献。在三星堆祭祀活动越来越兴盛的基础之上，从“神坛”的出现，到“神庙”的兴建，再到“祭祀坑”的形成，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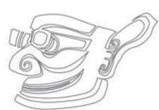
关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定名，我们认为主要有三条理由：第一，坑内器物基本上都是用于祭祀的神像和礼器祭品；第二，在瘞埋前曾举行过各种各样的祭祀仪式，具有特定宗教祭祀内容和含义；第三，祭祀坑是宗教祭祀礼仪活动的最终结果。至于三星堆中心祭祀区众多大型祭祀坑形成的原因，我一直倾向于“失灵法器掩埋说”。当时的社会充满着宗教狂热，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最终发生了严重的生存灾难和社会恐慌，人们就认为这些神器都已经彻底“失灵”了，于是通过多次盛大而奇异的“燎祭”，把平时放在神庙中的主要神器和祭器，搬到三星堆前的广场，对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祖先，举行了盛大的祭典，然后打坏焚烧神器和祭器，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表示把它们送回到了天上和神界，随后把国家的统治中心迁到了成都的金沙遗址。这次新发现六座祭祀坑后，我提出了“三星堆一号坑可能是因为瘟疫而为”的看法，在这场灾疫中，可能连群巫之长即国王也亡故了，因此在首次大规模的“燎祭”之后，就将国王专用的金杖放在祭祀坑的中央一起进行了掩埋。从一号坑的开口地层、土坑形制、器物特征、埋藏方式、骨渣堆积和坑口有建筑遗迹等情况看，它很可能是这八座大型祭祀坑中年代最早的一座。随后的灾情可能并未好转，反而更为加剧，因此人们便认为这些神器都已经彻底“失灵”，就用神庙中的大型神像、礼器、祭品、象牙等，继续进行了更大规模的

燎祭仪式，其中二、三号坑可能是同时祭祀埋藏的最大的一组。在举行最后一次祭祀活动时，可能连同被放弃烧毁的神庙墙体和剩余的残碎祭品，一起埋入了八号坑的象牙层之上，最终形成了“三星堆中心祭祀区”众多祭祀坑排列有序的情况。三星堆人最后可能迁都到了金沙，三星堆古国从此走向衰亡。三星堆“中心祭祀区”还得到了三星堆古国后人的精心保护和继续祭奠，此后这里一直没有再受到破坏，从而把最终的整个祭祀场所和几乎全部的文物宝藏，奇迹般地完整保存到了今天。至于打破了七号坑的六号坑，很可能是三星堆古国的“遗民”，在迁都若干年之后，再次来到这里进行“祭奠”所留下来的遗迹。而埋藏有大量金器的五号坑，可能是另一次单独的高规格的祭祀。由于五号坑的大小、方向和位置，都与六号坑比较接近，不排除它也是在三星堆迁都之后，古国的“遗民”来到这里进行“祭奠”时留存下来的遗迹。

正因为有这样一系列非常特殊的祭祀习俗，就使三星堆古蜀国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神权国家。我近年曾就此问题重点撰写了一组文章，包括探讨有关问题的内容和论据，现汇编于本书的“文明形态研究”“祭祀文化研究”两章之中，作为本书的一个主要内容，供大家研究参考。

“天门信仰”是指我们从对四川汉画的组合与主题研究开始，前推至古代蜀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等核心信仰观念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

“天门”是20世纪80年代发现于四川简阳汉墓石棺上的两个榜题文字，同时也发现于三峡地区巫山等地汉墓出土的一组鎏金铜牌饰上。四川汉墓中出土有大量的画像砖和画像石，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和信仰习俗的众多方面。过去比较多的是对单个或成组的画面进行考证研究，涉及整个墓室画像布局组合与主题思想的文章较少。“天门”榜题发现于门阙画像上方的中心位置，我觉得它可能表述了当时人们将大量画像布置在墓室中的核心思想，于是就与在四川省博物馆从事画像砖石保管研究多年的袁曙光一起，对已发现的汉代画像和墓葬资料进行了分类排队与综合研究，认为安装在墓门内侧的“门阙”画像砖所要表现



的，可能就是榜题上所说的“天门”，然后再用各种不同内容的画像，将整个墓室布置成了一个理想中的天国盛景。具体的内容包括了两大部分：一是以“天门”为开端，以掌握着“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为主神，由四方神兽守卫，有天神日月、祖神伏羲女娲相伴，众多已经升天成仙的仙人散居其中，使人能够长生不死的天国图景；二是以车骑为仪仗前导，以迎谒、宴饮、舞乐、燕居为主要场面，并将各种生活生产活动贯穿其间，表现了送迎墓主人进入“天门”，在天国中永远享用美好生活的完整过程。两方面汇合在一起，表达的就是将墓主人“送入天国，升天成仙”这样一个主题思想。

我与袁曙光合作的《“天门”考——兼谈四川汉画像砖（石）的组合与主题》一文发表后，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广泛认同。其后我们又撰写了一组文章，进一步细化了“天门”汉画各个组成部分的具体情况和意义，探讨了“天门”观念在砖墓画像砖、画像石、石棺、崖墓石刻、木棺铜牌、摇钱树上的各种表现方式，认为“天门”信仰是汉代神仙思想的一次飞跃与升华，对道教的产生及佛教本土化都有重要的影响。近年我们又从汉代摇钱树源自三星堆时期的“神树”、三星堆“祭祀图玉璋”上神山和船形物具有“天门”的性质等方面，探讨了三星堆古蜀文明时期可能就具有了“天门”的意识，认为三星堆时期的蜀人已经有了经天门升天成仙的理想。“天门”信仰表达出了古蜀人对天、地、人三界的认识，它既是理想的天国，又是现实中的天府，追求的是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相亲相通、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具有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因素，成为古蜀人信仰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天门说”是我的另一个重要学术观点，并与三星堆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本文集中选择了几篇论文，编入了“天门观念研究”一章之中，并收入了两篇蜀汉时期画像与佛像的研究文章。

在“区域文化研究”一章中，选入了我对凉山、绵阳、雅安、成都等地古文化和重要文物的几篇研究文章，涉及时间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战国秦汉。有的内容可以反映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面貌，有的发现为

研究三星堆玉文化内涵提供了佐证。严道古城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新都大墓为探讨战国时期蜀国向中原和楚文化学习，开始进行礼制改革提供了实证；都江堰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则是研究都江堰的兴建和秦统一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促进作用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这篇文章是我从事考古工作的处女作，对自己的考古生涯有一定的纪念意义。我的其他一些未收入这两个文集的考古报告和论文，可以参见本书附录中的“论著目录”。

我从小喜欢郊游探险，动手动脚找东西，学习考古正合心意。特别是工作后有幸遇到了三星堆，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简略情况可以参见附录中的两篇采访报道和一组考古回忆。自己离开第一线已久，研究工作也还不够细致，文章较多，看法不少，只是提出来供大家研究参考。其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够成熟或不大准确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我愿意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探索，继续为三星堆与巴蜀文化考古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2022年12月

## 后 记

本书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纪念建院七十周年时，为部分老同志编辑出版的个人论文集之一，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许多友人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三星堆博物馆提供了大量插图照片，出版社编辑做了严谨细致的编审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星堆考古事业至今已有九十多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1980年开始，在三星堆遗址连续进行了三十多次发掘，逐步揭开了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各时期的文化面貌。主要发掘保护和报告编写工作，是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单位领导指导下，在考古领队王有鹏、陈德安、陈显丹、雷雨、冉宏林等同志的主持下，经过全体发掘和保护研究人员共同努力完成的。这期间我有幸参加了其中一些调查研究和宣传组织工作，因工作需要执笔写过一些考古汇报和总结，逐渐有了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写过一些文章，受到社会欢迎。李学勤先生看到后，吸收我参加了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早期中国文明丛书》的编纂工作，指导我撰写了其中的《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卷，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成为自己的代表作。俞伟超先生又组织我参加了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长江文化研究文



库·文物考古卷》的工作，指导我与李明斌合写了其中的《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一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三星堆博物馆则以《探索三星堆丛书》的形式，为我编辑了一本名为《三星堆考古研究》的论文集，2004年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2004年退休时能有这样的成果，已经很满足了，此后曾几次准备封笔，并把藏书赠送给了三星堆博物馆。但我对三星堆考古仍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觉得三星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自己有些想法仍然希望能够讲出来，于是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探索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成因与价值等方面，继续写些东西，也曾经提出应该建立“三星堆学”的建议。特别是在纪念一、二号祭祀坑发掘三十年应约写了几篇文章之后，又喜逢在三星堆新发现发掘了六座大型祭祀坑，其间不断有媒体报刊来采访约稿，几年间又连续撰写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把自己一些新的想法都写了出来，现在通过这本文集把它们汇集在一起再次出版，以供大家研究参考。

我对三星堆文化特征成因和价值的基本认识可以简要概括为“神权国家”是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主要内因；“过度消耗”是三星堆快速衰亡并形成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由；“早期丝路”的交流是三星堆文化丰富多彩的外部原因；“多元一体”是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定位。同时我也对部分具体问题谈了个人的一些看法，其中肯定会有不准不确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文中引用了不少新旧考古资料和同仁意见，有些未能详细注明，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和歉意。关于三星堆遗址各期文化的年代分期和命名问题，我一直是使用原发掘单位的测定年代和意见，是否需要做出修改和完善，将以今后正式发表的综合发掘报告为准。

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确实有它的奇特和神秘之处，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这也正是它吸引人之处和魅力所在，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发掘和研究。三星堆考古事业是百余年来几代考古人长期奋斗的成果，特别是第一线发掘研究和保护宣传工作者的功劳。自己有幸参与其

中，做了一点工作，本文集和另外几本小书，可以算是前段工作的一个小结。目前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和三星堆考古事业发展的高潮已经到来，自己虽已年届八十，但对三星堆考古研究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情，愿意与大家一起努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继续贡献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赵殿增

2023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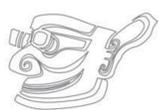
## 编后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2023年，我院迎来了70岁的生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家学术文集》正是为庆祝我院成立70年而精心策划的一份礼物，收录了我院老一辈杰出文物考古工作者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共九卷。“著述前辈的开拓，启迪来者的奋斗，赓续传承美好。”这是院领导发起出版本套文集的初衷，也是全院干部职工多年以来共同的期待。

文集筹备工作始于2022年初，从征求上级领导意见，到广泛收集我院离退休职工及离世专家家属的建议和意愿，再到组织专家论证、院学术委员会研究，最终明确了本套文集的整体定位、选文标准和著录体例。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家学术文集》编辑委员会于2022年7月成立，主要负责落实文集资料收集查证、作者方联络、出版对接等工作。或因联系不上有些曾在我院工作过的专家、专家家属，或因已经有机构为一些专家出版过个人文集，或因有些专家身体抱恙，或因部分资料年代久远、查证困难，加上编辑时间有限，还有一些曾为我院事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专家的文集未能成行，前辈们的风采也未能尽善尽美地呈现，略有遗憾。但未来可期，希望在我院文物考古事业更进一步、



迈上新台阶时，后辈们能不忘前辈们的辛劳和奉献，续启为前辈们出版个人文集的计划。

本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同时得到了诸多专家、前辈的指导和帮助。还有巴蜀书社的编辑们，他们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高质量的要求，确保了文集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在此，向关心支持本文集出版的工作单位和工作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家学术文集》编辑委员会

2023年10月